

September 2017

## The Confucian Character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oetry, Its Role in the *Bixing* Tradi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Lüshi*

Yao Zh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Zhong, Yao. 2017. "The Confucian Character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oetry, Its Role in the *Bixing* Tradi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Lüshi*."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5): pp.33-4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5/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晚唐五代诗格的“儒者”品格及其对比兴笺诗体系的拓变与近体诗学建构

仲 瑶

**摘 要:** 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出现是“儒者”主体意识与诗风极盛背景相结合之产物。与以科举为导向的经学教育相交织,诗成为孤寒沉沦之士修身立心之要途。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者之心的深意,形成了风骚雅正的基本诗学思想。同时,又将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比兴”“讽刺”理论加以拓变,形成“物象比”“内外意”等新批评概念,对晚唐诗的重立“意”以及隐喻化和象征性思维也有深刻影响。进而,又从“诗道”与“格调”两大层面提升了近体的诗学、诗史地位,其在唐诗学形成中的独特价值不容抹杀。

**关键词:** 诗格; 儒者; 苦吟; 毛诗正义; 比物讽刺; 诗学建构

**作者简介:** 仲瑶,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隋唐诗歌研究。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邮政编码:410012,电子邮箱: xueguo2005@163.com

**Title:** The Confucian Character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oetry, Its Role in the *Bixing* Tradi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Lüshi*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the numerous poetry formats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s the result of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pularity of poetry as well. Poetry, interwoven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Confucian scholars' self-cultivation. Therefore, the form of "industrious and bitter versification" reflects those Confucians' inner world. Meanwhile, the metaphorical satire embedded in *Mao Shi Zheng Yi* is developed into such new concepts as *bixing* or "image analogy and evocation", and "inner and outer meaning", which influences the valuation of "conception" and the metaphorical and imagistic thinking of late Tang poetry, and, as a result, promotes the status of *Lüshi*, or metrical poetry both in essence and artistic style.

**Keywords:** poem format; Confucian; industrious and bitter versification; *Mao Shi Zheng Yi*; metaphorical satire;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of *Lüshi*

**Author:** Zhong Yao, is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ncient poetry from the Han to Tang Dynasties. Address: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uth of Lushan Road,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12, China Email: xueguo2005@163.com

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批评形态,诗格著述在晚唐五代的大量出现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然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一问题的探讨仍主要集中在其与进士科试诗赋之关系、指导初学之功用以在诗艺层面的苦心孤诣,且总体评价不高。近年来,晚唐五代诗格的“物象”“内外意”理论与苦吟风气之关系及其政教内涵<sup>①</sup>等问题得到了集

中关注。但总体而言,对于“诗格”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诗学思想、撰述体例、批评方法及其对近体诗史地位之建构等重要问题却远未有足够认识。本文拟从晚唐五代士人尤其是孤寒之士的“儒者”主体意识以及“诗教”“诗道”观念的凸显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加以细致考察和论证,以期对晚唐五代诗坛的“苦吟”风气、诗派的形成等一

系列文化现象以及唐人近体诗学的建构路径有更加客观而深刻的认知。

### 一、佯狂未必轻儒业： 晚唐五代士人的“儒者”主体意识

承六朝之陵夷,唐兴,世崇儒学。永徽四年(653年),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皮锡瑞《经学历史》曾云:“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98)。与科举层面的“儒业”<sup>②</sup>相交织,“儒者”以及家世儒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盛唐士人性情脱略,以功业自许,每嗤鄙儒生,内里却仍以“儒”者自居,所谓“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王维《济上四贤咏崔录事》)。及至中唐,“世敦儒业”(刘昫 4340)者日多。与此同时,基于对安史之乱的反思,以李华、独孤及、萧颖士、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士人“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刘昫 4230),力倡“君子之儒”,“儒者”的道统色彩大彰。韩愈荐张籍云:“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以章圣朝崇儒尚德之道”(董诰 5564)。

晚唐、五代之际,干戈扰攘,“文儒”之业反盛,“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周勋初 157)。加之门第复振,孤寒之士艰于仕进。“为儒逢世乱,吾道欲何之”(韦庄《寓言》)的迷茫一变而为激切之语,如徐铉《观人读〈春秋〉》:“日觉儒风薄,谁将霸道羞。乱臣无所惧,何用读春秋。”至如罗隐、陆龟蒙一辈乃至因此走入浮浪、猖狂之途,论者也以此多称晚唐士风浇薄。但透过浮华、猖狂的种种表象,会发现晚唐士人尤其是孤寒之士仍是“儒道”的最忠实恪守者。刘轲《再上崔相公书》云:“业为儒生,阅天下利病,苟无一词闻天下善否,将何以见江汉之士”(董诰 7673)。又李涉《怀古》:“尼父未适鲁,屡屡倦迷津。徒怀教化心,纡郁不能伸。一遇知己言,万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则,孰不挹其源”,在慨叹儒道不彰之余,又透出坚守和自信之意。

承中唐对“君子之儒”的激扬,晚唐五代士人中不乏深怀补裨之思者:“弱岁谬知道,有心匡皇符”(皮日休《奉酬崔璐进士见寄次韵》)、“必贡安时策,忠言奈尔何”(贯休《闻友人驾前及第》)。

在诗文往还中,亦屡屡以“儒道”“吾道”相砥砺,如“自许亨途在,儒纲复振时”(郑谷《咏怀》)、“儒为君子儒,儒道不妨孤”(杜荀鹤《将归山逢友人》)、“吾道谅如斯,立身无苟且”(刘驾《青门路》)、“闻君欲自持,勿使吾道低”(曹邺《寄贾驰先辈》)。所谓“佯狂未必轻儒业”(齐己《过陆鸿渐旧居》),可以说是晚唐五代士人精神世界的最深刻写照。

晚唐五代的诗格作者如郑谷、黄损、徐夤、王起、司空图、徐衍等人皆幼习儒典,且多系进士出身。在对经典的长期浸淫中,政教之思和儒者之行在其思想、人格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与科举试诗相交织,当诗歌极盛之际,在以诗忧世乱、悯苍生的同时,阐宏诗道以补裨教化也成为这一群体的应有之义。郑谷曾撰《国风正诀》一卷,“分六门,摭诗联,注其比象君臣贤否,国家治乱之意”(周绍良 2089),匡弼之意,皎然可窥。观其诗亦充满了对风雅道消的感喟:“国步未安风雅薄”(《寄赠杨夔处士》)、“骚雅荒凉我未安”(《静吟》)、“骚雅全休道甚孤”(《将之庐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二首》)。至于司空图的“空将忧国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其三)亦可见儒者之心。《雅道机要》的作者徐夤在感慨“殊时异世为儒者,不见文皇与武皇”(《东京次新安道中》)的同时,亦以“惟有经邦事,年年志尚存”(《昔游》)自许;又与黄滔友善,观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董诰 8671),亦可知“雅道机要”之真正内涵所在。

进士群体之外,晚唐诗格的另一个主要身份构成是所谓的诗僧群体,如贾岛、齐己、司空图、虚中等。历来论者多强调其诗僧身份以及释典在思维、概念层面的诸多影响,而“忽略”了这一群体的“儒者”主体意识。有唐一代,虽号称三教并立,但中心仍是“儒”,道、释二家被纳入到儒家话语系统之中,并在儒家政教话语系统之中寻找到其存在的合理性。柳宗元有“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皆有以佐世”(董诰 5850),刘禹锡认为佛教“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董诰 6162)等,都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不仅如此,晚唐五代诗僧或本即儒生,或熟习儒典,如杜殷赞杜顺和尚“已履儒迹,心达彼岸,每耽儒典之暇,剧趣真心”(董诰 8317)。又

司空图《送草书僧归楚越》亦云：“虽幼落于佛，而学无不至，故逸迹遒劲之外，亦恣为歌诗，以导江湖沉郁之气，是佛首而儒其业者也”（董诰8489）。所谓“佛首而儒其业者”，也可以说是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一个共同特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释入儒的贾岛。关于贾岛与韩孟诗派的渊源，论者多着眼于二者在奇诡艺术风格层面的契合，却忽略了二者在狂狷气质和讽刺精神层面的相通。孟棨《本事诗》“怨愤第四”条载：

贾岛于兴化园亭凿池竹，起台榭，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于亭内题诗‘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其侮慢不逊，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终。（丁福保17）

这种不逊之态正是韩愈所谓寒士不平之气，而又集中体现于对时政的讽刺。至于《风骚旨格》的作者齐己，亦多讽刺之篇，如《寓言》：“造化安能保，山川凿欲翻。精华销地底，珠玉聚侯门。始作骄奢本，终为祸乱根。亡家与亡国，云此更何言。”大抵感激于唐末五代奢靡之风。至如“艺术未甘销勇气，风骚无那激刚肠”（《送谢尊师自南岳出入京》），可谓自道心曲。

由上所述，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涌现绝非仅在于指导初学或耽匿诗艺，更是以科举为导向的“儒业”大盛，由此而来的“儒者”主体意识觉醒之产物。明乎此，才能对晚唐五代的“苦吟”风气、诗派的形成等一系列文化现象有更宏观、深刻的认知，才能透过琐碎支离的文本和玄虚古怪的表述方式更融通地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诗学思想及其相互之间的脉络。

## 二、诗旨未能忘救世： 孤寒之士的苦吟与诗心

与汉末儒生以经学自守相似，面对动乱的时局和艰难的举业，晚唐五代孤寒之士纷纷退而著述，如林慎思《申蒙子序》：“予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著儒范七篇，辞艰理僻，不为时人所知”（董诰

8433）。元墟，“世奉儒宗，不求闻达，心存畎亩，性好林泉，知数知斗，读易问礼”，“知艰而退，自保逍遥，乃涤去纷拏，归心淡泊，宅身云岫”（董诰8543）。这一群体由此成为儒典与儒道在乡土社会的传承者，杜荀鹤《貽里中同志》：“乡里为儒者，唯君见我心。诗书常共读，雨雪亦相寻。贫贱志气在，子孙交契深。古人犹晚达，况未鬓霜侵。”与其说晚唐隐逸之士自遁于壶中天地，毋宁说是以退守的姿态维系斯文于不坠：“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恒超《辞郡守李公恩命》）。

在传承经典，恪守儒道之外，与中唐古文家以文载道不同，晚唐五代文士大抵以“诗”来彰显“儒道”。在他们的观念中，“儒道”与“诗道”是二而一的，所谓“吾道在五字，吾身宁陆沈”（杜荀鹤《秋日怀九华旧居》）。由于“明经”科的衰落和进士科的愈发尊崇，诗以及诗教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经学为“下学立心”的社会文化功能，杜荀鹤《读友人诗》云：“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名应高日月，道可润公卿。莫以孤寒耻，孤寒达更荣”，可谓深切地道出了诗尤其是五律一体在晚唐五代士人文化中的独特意蕴。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道”的深刻意蕴，贯休《偶作》：

十载独肩扉，唯为二雅诗。道孤终  
不杂，头白更何疑。句冷杉松与，霜严鼓  
角知。修心对闲镜，明月印秋池。

意象清冷，比兴之中，自有一种儒者的澄澈之气。又杜荀鹤《哭方干》：“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况有数篇关教化，得无余庆及儿孙。渔樵共垒坟三尺，猿鹤同栖月一村。天下未宁吾道丧，更谁将酒酹吟魂。”方干终身未第，平生德业唯在诗。所谓万古存之诗名和“教化”“余庆”云云，毋宁说是杜荀鹤对自身以及整个群体的一种伤悼与安慰。这或许正是方干，也是无数苦吟诗人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以儒者自居的苦吟诗人也并非全然沉溺于诗艺本身，一旦有机会仍自觉以诗为讽谏。《唐诗纪事》载：“唐末寇乱，（贯）休避地渚宫，荆帅高氏优待之，馆于龙兴寺。会有谒宿，话时政不治，乃作《酷吏词》以刺之云”（王仲镛1955）。又

何光远《鉴戒录》云：“梁朝杜舍人荀鹤，为诗愁苦，悉干教化。[……]在梁朝，献朱太祖《时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赋敛”（傅璇琮 5939）。以“儒者”之心为内核，晚唐五代的“苦吟”风气已超出单纯的文字语言层面的雕琢而表现出对于“诗心”的某种苦心孤诣：“天畏斯文坠，凭君助素风。意深皆可补，句逸不因功”（李咸用《九江和人赠陈生》）、“自知清兴来无尽，谁道淳风去不还。三百正声传世后，五千真理在人间”（齐己《咏怀寄知己》）、“吟近秋光思不穷，酷探骚雅愧无功。茫然心苦千篇拙，瞑坐神凝万象空”（李山甫《答刘书记见赠》）、“包含教化剩搜罗，句出东瓠奈峭何”（曹松《赠镜湖处士方干二首》其一）、“曾无一字干声利，岂愧操心负至公”（齐己《吟兴自述》）。

以《毛诗正义》为主要传播和影响途径，晚唐五代士人的诗心和诗道又集中体现为教化与美刺，如吴融《禅月集序》：“夫诗之作，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讽刺之。苟不能本此二道，虽甚美，犹土木偶不住于气血，何所尚哉！[……]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董浩 8643）。又顾云《唐风集序》：“咏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弟良顺，人伦纲纪备矣”（董浩 8596）。其中，工于比兴、讽刺之体者颇多，如唐备，“工古诗，多涵讽刺，颇干教化，非浮艳轻斐之作”（周勋初 2159）；王毂，“辞多寄寓比兴之作”（周勋初 2236）。此期“咏古”“咏史”诗的发达也是“诗道”的独特体现。胡曾《咏史诗自序》云：“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奇而已。”“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补裨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

在延续初唐诗格偶对、声律技巧的同时，晚唐五代诗格之“格”与“式”已深入到“理”“道”层面。理者，“谓义理之理，美、刺、箴、海之类是也”（张伯伟 352）。又《文苑诗格》“褒赞国风”条云：“为诗之道，义在裨益，言意皆有所为”（张伯伟 366）。《二南秘旨》开篇即“论风之所以”“论风骚之所由”“论二雅大小正旨”“论变大小雅”，最能见其旨趣。王玄《诗中旨格》亦称：“予平生于二南之道，劳其形，酷其思，粗著于篇。虽无遗格之才，颇见坠骚之志。且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明则咏，时暗则刺之”（张伯伟 456），与《二南

秘旨》《风骚旨格》一脉相承。“诗”也因此被区分为“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诗”。前者的标准是“雅而正”，后者的特点是“才而辩”。能为“诗人之体”者，则自有高格。五代之人盛推贾岛、姚合、齐己、郑谷显然不仅在于推敲之能，乃视诸家为“诗人之诗”和“诗人之体”故也。《雅道机要》云：“凡为诗者，先须识体格，未论古风，且约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张伯伟 441）。

与之相应的，诗格作者在赠答唱和中亦屡以风雅之道自许、互勉，如齐己“君闻国风否，千载咏关关”（《寄勉二三子》）、“二南风雅道，从此化东周”（《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应见周南化”（《送人游雍京》）、“他年二南化，无复更衰微”（虚中《寄华山司空图二首》其二）。诸家之诗也正因为成为五代诗格家心目中的楷式，徐衍《风骚要式》“君臣门”条云：

齐己《春日书怀》：“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此是大雅，美帝王盛德之形容也。齐己《秋日书情》：“堪忆惠休临老岁，肯将名污碧云才。”此是小雅，美诸侯之德也。郑谷《登渭阳城楼诗》：“后车能见前车覆，今日难忘昔日忧。”此乱时已兆，君暗小人竞进也。（张伯伟 451）

以“诗道”之维系自任，诗派因之以成。方干《哭秘书姚少监》：“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万古名。入室几人成弟子，为儒是处哭先生。家无谏草逢明代，国有遗篇续正声。”与杜荀鹤对方干儒者形象的塑造相似，方干亦以“为儒”“正声”赞姚合。除了“一字师”式的诗艺雕琢，晚唐五代“门人”“诗弟子”称呼中所蕴含的鲜明的道统色彩亦由此可窥。以诗道为纽带，孤寒之士获得了一种群体身份认同，并以风雅相激扬：“澄心不出风骚外，落笔全归教化间”（方干《赠郑仁规》）、“半生猿鸟共山居，吟月吟风两鬓疏。新句未尝忘教化，上才争忍不吹嘘”（李昭象《山中寄崔谏议》）、“闷见有唐风雅缺，敲破冰天飞白雪”（徐仲雅《赠齐己》）。兼具道统与诗艺两大功能的诗格著作因此风行于世，齐己与郑谷、黄损三人曾著《今体诗格》，“为湖海骚人所宗”，所谓“湖海骚人”，当即习文业儒、沉沦不遇的孤寒之士。而现

实的萧瑟又进一步加剧了以道统自矜、自慰的复杂文化心理,“诗格”由此成为秘旨、机要,“诗”与“诗道”也被玄虚化,所谓“至玄至妙,非言所及”(494)。

由上所述,晚唐五代诗格、诗风之极盛是以诗教观念所激发的崇高感乃至悲剧意识为内在支撑,而非单纯的艺术热情。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苦吟耽诗的风气,乃至由“诗道”而入“诗魔”。相较之下,释典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技”与“艺”以及个别术语和概念的层面。如果忽略前者,而一味强调后者,则会从根本上妨碍对于《诗格》的总体认知和把握,也就无法究明这一独特批评形态在唐诗学上的真正价值及其弊病与影响。

### 三、风骚、雅正观念与“物象比” “比物反讽”理论

与科举与儒学教育密切交织,作为诗教观念的直接产物,晚唐五代诗格在思维、体例等诸多层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政教内涵。《文苑诗格》“宣畅骚雅”条云:“为诗之道,切在裨益《国风》”(张伯伟 363),又“讽谏”条云:“为诗不裨益,即须讽谏”(张伯伟 366)。此二部诗格皆托名于白居易,与白居易的“讽喻”诗歌理论之间显然有着直接关系。“分明古雅声,讽谕成凄切”(李咸用《览友生古风》)的“古风”也因此为晚唐诗格家所重视。观贾岛《古意》(碌碌复碌碌)诸诗与孟郊的古风诗可谓同道。《二南秘旨》标举“六义”与韩孟一派之推重古体、重振诗“道”内里也是相通的。尤其是古乐府一体的讽刺特质也被重新凸显。徐夤《雅道机要》“明题目否臧”条云:“如曰引、吟,乃刺忠臣遭佞而离散也”(张伯伟 425)。这种观念与贯休、齐己、皮日休等人的古乐府创作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诗格作者并非一般所认为的仅着意于五律,在其潜在的诗歌层级中与“诗道”关系更为密切的古体、古风地位甚至更高。

讽喻之外,受诗大序声音之道与政通观念的影响,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尤重风雅正变之别。《二南秘旨》“论风之所以”条云:“君之德,风化被于四方,兹乃正风也。或否塞贤路,下民无告,即正风变矣”(张伯伟 373)。又“论变大小雅”条云:“大小雅变者,谓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

下进阿谀,诗人则变雅而讽刺之。[……]如诗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此变大雅也。[……]如诗云:‘绿衣黄裳’,此变小雅之体也”(张伯伟 374)。其对“正风”“变大雅”“变小雅”的理解大抵衍自《毛诗正义》,而呈现出更浓的政教意味。作为贾岛的追随者,齐己《风骚旨格》在《二南秘旨》的基础上又有“六诗”之说,即“大雅”“小雅”“正风”“变风”“变大雅”“变小雅”。至于虚中《流类手鉴》之“大雅体”“变小雅体”“正风体”“变风体”等皆一脉相承。晚唐五代《诗格》著作之间的体例渊源和道统脉络由此可窥。皮日休的“正乐府”观念及其诗学内涵正以此为背景。晚唐五代诗格家对风雅正变之别的凸显与对现实层面的政教兴衰之感慨无疑是相通的。

与盛唐诗的重“风”不同,晚唐五代诗格尤重“雅”。《二南秘旨》“论六义”云:“雅者,正也,谓歌讽刺之言,而正君臣之道。法制号令,生民悦之,去其苛政”(张伯伟 372)。相比“歌事曰风”,“雅”的徒诗和政教色彩更浓,且有兼统“风”“颂”之意。《二南秘旨》“论二雅大小正旨”条云:“四方之风,一人之德。民无门以颂,故谓之大雅。诸侯之政,匡救善恶,退而歌之,谓之小雅”(张伯伟 374)。所谓“雅”之大小,即政教施行的广狭。政教之外,诗格家之崇“雅”又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诗教观念关系甚密。《金鍼诗格》“诗有上中下三等”条云:“纯而归正者上等也,淡而有味者中等也,华而不浮者下等也”(张伯伟 355)。所谓“纯而归正者”即前述“诗人之体”。感于“惆怅雅声消歇去”(齐己《渚宫谢杨秀才自嵩山相访》)的惨淡现实,“大雅”一体因其所蕴含的王政德化内涵和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风格尤为诗格家以及苦吟诗人所推:“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裴说《经杜工部坟》)、“物外搜罗归大雅”(方干《赠李郢端公》)、“诗皆大雅言”(齐己《过陈陶处士旧居》)、“三编大雅曾关兴”(李咸用《和彭进士感怀》)。

“雅”体在晚唐诗格中的尊显也是初唐以来以“雅正”去“浮艳”“浮华”诗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sup>③</sup>“浮艳”一语,本源于对齐梁诗尤其是宫体的批判。至中晚唐与诗赋取士相交织,近体尤其是试律一体也屡遭“浮艳”之责:“考文者以声病为非,而惟择浮艳”(董诰 3735);“亡于教化之道,

以妖艳为胜”(董诰 8878)。其时七律一体尤浮艳,如赵光远辈“皆金鞍骏马,将子弟恣游狭邪”“辞意多裙裾妖冶之态”。基于此,晚唐五代诗格多反对“浮艳”之体,《雅道机要》“叙体格”诗有十一不之九即是不“浮艳”。又《文苑诗格》“宣畅骚雅”条云:“古诗‘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今诗‘手持双鲤鱼,目送千里鸿’。此雅意,无有浮艳也”(张伯伟 363)。至于“若空言境,入浮艳”(张伯伟 365),“若古文用事,又伤浮艳”(张伯伟 366),则皆将近体的写景、用事等体制视为浮艳。当“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郑谷《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榛芜感旧怆怀遂有追纪》)之时,孤寒之士以雅淡之五言破子弟之浮华也因此具有某种道德意蕴。喻凫,“体閨仙为诗,尝谒杜紫薇不遇,乃曰:‘我诗无绮罗铅粉,宜其不售也’”(王仲镛 1393)。这是包括《二南秘旨》在内的晚唐五代诗格以疏淡甚至是枯槁为雅的深层原因。尚颜《言兴》云:“屹屹被吟牵,因师贾浪仙。江山风月处,一十二三年。雅颂在于此,浮华致那边。犹惭功未至,漫道近千篇。”又曹松,“学贾岛为诗,深入幽静”(周绍良 2267)。此外,郑谷亦以“篇篇高且真,真为国风陈。澹薄虽师古,纵横得意新”(《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盛赞薛能。

在尊雅的同时,当政衰俗怨之时,晚唐五代诗格家又重接“骚”绪。《二南秘旨》“论风骚之所由”条云:“骚者,愁也,始乎屈原。为君昏暗时,宠乎谗佞之臣。含忠抱素,进于逆耳之谏,君暗不纳,放之江南,遂为《离骚经》。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变风而入其骚刺之旨,正其风而归于化也”(张伯伟 373)。以诗道激扬者也往往“骚雅”并称:“骚雅近来颓丧甚”(李洞《送邵先辈归觐华阴》)、“国凭骚雅变浮华”(章孝标《赠刘宽夫昆季》)。但就诗学整体评价序列而言,变风之“骚”则居“雅”之下。《诗评》“诗有三体”条云:“诗人之体为上,骚人之体为中,事流之体为下”(张伯伟 501)。这种标准和趣味对晚唐五代的乱世哀怨之音不无针砭之意。

在复归汉代经学、诗教话语体系的同时,作为唐诗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和组成部分,晚唐五代诗格还秉承六朝文学本位的批评传统。以前者为统纲,诗格作者又借助于新批评概念和术语的提出对上述两大批评传统和话语方式进行整合。在这之中,“物象”又是诗格家用以沟通、平衡

“道”“艺”两大层面的核心概念。与郑笺、刘勰以及盛唐诗论偏重“兴”和“兴象”不同,与以体物、写景见长的近体尤其是五律为主要批评对象相应的,晚唐五代诗格尤重“比”与“物象”。《二南密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条云:“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机,比而用之,得不宜乎”(张伯伟 379)。又云:“比者,类也,妍媸相类、相显之理。或君臣谗佞,则物象比而刺之;或君臣贤明,亦取物比而象之”(张伯伟 372)。相比“兴譬”的深婉,比物的讽刺意味往往更直白、显豁,更能体现诗教意图,但也因此失去了盛唐诗的兴象玲珑,不可凑泊之美。

在延续毛传、郑笺之“兴譬”理论以及五臣注《文选》“饰物反讽”之说的基础上,晚唐诗格家又衍出“内外意”这一新的批评术语。《金鍼诗格》“诗有内外意”条云:

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雨、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张伯伟 351—52)

由此,将物象(主要是景象、物色)的表意与君臣治乱美刺之内意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对应和操作规则。又《雅道机要》“明意包内外”条举“花落”例云:“外意须言风雨之像,内意须言正风将变。诗曰:‘不能延数日,开即是春风’”(张伯伟 438)。对讽刺的强调,使得“内意”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外象。《雅道机要》云:“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张伯伟 445)。中晚唐诗尤其是咏物诗的重视“立意”与这种诗格重内意的思维方式有着很深的关系。

在郑笺以及五臣注中频繁出现的天象、四时类的政治人伦譬喻在诗格家手中也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二南秘旨》“论篇目正理用”条云:“早春、中春,正风明盛也。春晚,正风将坏之兆也。夏日,君暴也。夏残,酷虐将消也。秋日,变为明时,正为暗乱也。残秋,君加昏乱之兆也。冬,亦是暴虐也。残冬,酷虐欲消,向明之兆也。”又“论引古征用物象”条云:“四时物象节侯者,诗家之血脉也,比讽君臣之化深”(张伯伟 378—

79)。又僧虚中《流类手鉴》“物象流类”条云：“日午、春日，比圣明也。残阳、落日，比乱国也。[……]春风、和风、雨露，比君恩也。朔风、霜霰，比君失德也。[……]浮云、残月、烟雾，比佞臣也”(张伯伟 418—19)。大抵沿《国风正诀》《文苑诗格》《风骚旨格》而更加庞大，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比喻物象群。晚唐诗多写“春晚”“残秋”之景，呈现出衰飒、萧瑟之气与以四时物象对应政治兴衰的譬喻思维也有着密切渊源，如“春风底事轻摇落，何似从来不要开”(王枢《和严恽落花诗》)等都透出了晚唐士人普遍的伤世情怀。在诗格家眼中，这种衰世感伤情怀正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最好注解，并由此产生了：“落花，国中正风堕坏也”(张伯伟 378)的释义。

物象之外，晚唐诗歌的创作题材也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色彩，并被赋予了明确的比刺和政教内涵：

游寺院，贤人趋进，否泰之兆也。题寺院，书国之善恶也。春秋书怀，贤人时明君暗，书进退之兆也。题百花，或颂贤人在位之德，或刺小人在位淫乱也。牡丹，君子时会也。鸛鹄，刺小人得志也。观棋，贤人用筹策胜败之道也[……]赠隐者，君子避世也。(张伯伟 378)

晚唐人所热衷的“隐逸”“贫居”等题材也从现实书写变成了一种象征化的行为，所谓“贫居，君子守志也”“晚望，贤人失时也”(张伯伟 378)。陈振孙曾讥之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陈振孙 645)。

作为晚唐诗论中最独特的一种表现形态，诗格家们在继承《文选注》笺释之法的基础上，又将“内外意”衍为作诗之法。《雅道机要》“明意包内外”条举“闻蝉”例：“外意须言音韵悠扬，幽人起兴，内意须言国风芜秽，贤人思退之故。诗曰：‘斜阳当古道，久客独踟蹰’”(张伯伟 439)。又“讽刺题”条云：“晚望、落叶、夕阳、闻蛩。讽刺句：白云风散尽，红叶水流来”(张伯伟 439—40)。通过这种方式，晚唐人的五律创作在写景咏物艺术和伦理功用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如同初唐类书之于事典，利用这些由一系列物象

和题材所构成的庞大冗杂的比喻符号库，以诗为禅的晚唐孤寒之士创造了一个或许只有其自身才能充分感知的意义世界。然而，对于那些于这一套“密码”系统完全陌生的读者而言，晚唐绝大部分此类作品如“相思坐溪石，微雨下山风”一类情韵之外，实无深曲意味可言。

但另一方面，经过初盛唐以来风雅比兴思想的洗礼，中晚唐的物象描摹毕竟又不同于齐梁式的吟风弄月，而在整体上透出一种时代所带来的幽微意绪和象征色彩。借助于“物象”“内外意”和“比物讽刺”等概念，中晚唐人对齐梁诗尤其是备受嗤鄙的咏物一体的改造显得更为稳熟，如罗隐《鹭鸶》、李群玉《失鹤》、唐彦谦《垂柳》、陆龟蒙《白莲》、郑谷《燕》等咏物之篇大抵能于物色白描之中而有寄托。这种比物讽刺的思维和创作方式也在客观上增强了晚唐诗尤其是咏物诗的讽刺性、隐喻性，如贾岛《病蝉》：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鸛鸟，俱怀害尔情。

以病蝉自喻，语含讥刺，故《鉴诫录》云：“岛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傅璇琮 5931)。晚唐人推崇贾岛，而称其“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张伯伟 441)，正是从风雅之道以及对物象内在“深意”的涵咏而来。其中，最能体现晚唐诗之隐喻与多义性的无疑是李商隐及其众多比兴深婉的咏物诗，如《流莺》：“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即通过对“莺”之“外在象”的刻画寄托了浓重的身世之感，达到了“内外意”的融合。其众多无题之篇也多借艳情、仙事以发感慨讽喻之思。元好问《论诗绝句》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道出了义山诗尤其是咏物诗的隐晦婉曲风格与比兴传统之间的深刻渊源。中晚唐咏物诗复盛而又自别于齐梁咏物诗正在于此。

由上所述，晚唐五代诗格在著述思想以及体例等诸多层面都深受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经学阐释话语的影响。在五臣注文选“比物反讽”的基础上，诗格家们通过“物象”“比物讽刺”等概

念和方法的提出,将六朝以来的诗歌作品悉数纳入经学话语体系之中,形成了一个空前的诗教阐释体系,对明清《诗比兴笺》一类的诗学著作具有直接的影响。由于本身浓厚的蒙书色彩和鲜明的实践特性,加之与试诗、试赋写作的复杂交织,诗格理论对晚唐诗歌重视“立意”以及讽刺性、隐喻化、象征性乃至题材、风格的类型化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四、“诗教今古之道皆然”与近体诗史地位的提升与建构

自初唐以迄中晚,基于“风雅”“比兴”观念的阐发,从陈子昂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到孟郊的“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复古论者对齐梁诗歌的批判可谓一以贯之。与齐梁诗渊源密切的近体也一并遭到批判。元结《篋中集序》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傅璇琮 299)。尤其是试诗一体,更被视为“亡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董浩 8878)。与创作层面的繁荣相应的,中晚唐是近体诗学的重要发展期。除了诗文集序以及以《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为代表的一众近体诗选,以近体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晚唐五代诗格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作用。早自皎然《诗式》即已透出提升近体诗史地位的意图和尝试。“不用事第一格”条云:

今所评不论时代近远,从国朝以降,其中无爵命有幽芳可采者,拔出于九泉之中,与两汉诸公并列。使攻言之子体变道丧之谈,于兹绝矣。(张伯伟 253)

这一基本思路,在贾岛的《二南秘旨》中得到了延续。“论古今道理一贯”条云:

小手皆言《毛诗》及《文选》诸公之作是古道,与今不同,此不可与言也。诗教今古之道皆然。(张伯伟 377)

其中,“小手”“古道”云云,正是初唐以来的复古之谈。“诗教今古之道皆然”,则试图泯灭近

体在载道和教化功能方面与古诗的差距。但古近体的体制差异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与皎然仍以古诗为高格不同,以五律见工的贾岛等人更尝试从“理”“道”层面肯定近体在“风雅”之理道和政教价值,从而为奉为圭臬的大历诸子以及姚、贾等争得一席之地。徐衍《风骚要式》云:“夫诗之要道,是上圣古人之枢机。故可以颂,可以讽。‘迓主事父,远之事君’。今之辞人,往往自讽自刺而不能觉”(张伯伟 451)。

与五臣注以比兴之法笺汉魏古诗以及对《文选》“秘旨”的发挥相似,晚唐五代诗格家将齐梁诗中的绮思之篇也赋予了君臣大义。虚中《流类手鉴》举江淹“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句云:“此君暗臣僭,贤人不任也”(张伯伟 422)。按江淹此篇本拟汤惠休艳诗,写男女相思之意。在以比兴之法笺释、改造齐梁诗的同时,晚唐五代诗格家又顺而推衍,将唐人近体也纳入到比兴笺诗体系之中,如王维《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此比君臣道合也。”李洞《野望》:“柳色舞春水,花阴香客衣”,“此比贤人欲进也”(张伯伟 457)。马戴《春思》“初日照杨柳,玉楼含翠阴”,“此比君恩不及正人也”(张伯伟 421)。其中,不乏真有比兴讽刺之义者,如己师诗:“‘瑞器藏头角,幽禽惜羽翰。’此比物讽刺也”(张伯伟 421)。按此诗出自齐己《溪斋二首》其一:“岂敢言招隐,归休喜自安。一溪云卧稳,四海路行难。瑞兽藏头角,幽禽惜羽翰。子猷何处去,老尽碧琅玕。”寄寓了隐沦之士的不平与微讽。

在这之中,与齐梁体渊源甚密,以五律见长,备受晚唐五代诗格家推崇的大历诗歌更是被慷慨地赋予了鲜明的政教伦理内涵。《二南密旨》“论总显大意”条注解李嘉祐《和苗员外雨夜伴直》云:

“宿雨南官夜,仙郎伴直时。”此见乱世臣节也。“漏长丹凤阙,秋冷白云司。”此见君臣乱暗之甚。“萤影侵阶乱,鸿声出塞迟。”此见小人道长,侵君子之位。“萧条吏人散,小谢有新诗。”此见佞臣已退,贤人进逆耳之言。(张伯伟 381)

全诗以典雅清华为本,于写景、事典中透出一

种清幽意绪。末句以大历人最倾慕的谢朓比赞苗员外,是典型的雍容唱和之体,所谓“佞臣”云云显系附会。其他,如卢纶诗:“‘鱼网依沙岸,人家在水田。’此小民以法无所措手足也”(张伯伟 422)一类,亦属牵强附会。大历诗歌却也因此得以像齐梁诗一样被纳入到晚唐人的“风雅”之道中。

至五代诗格中,则又进一步将晚唐五律诸家如贾岛、姚合、齐己等人的五律纳入比兴笺诗体系之中,如《流类手鉴》“举诗类例”云:

阆仙诗:“萤从枯树出,蛩入破阶藏。”此比小人得所也。

己师诗:“园林将向夕,风雨更吹花。”此比国弱也。

无可诗:“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此比不招贤士也。(张伯伟 421—22)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大抵仍以失于牵强附会者多。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曾不无困惑道:“司空表圣奇郑都官幼慧,评为一代风骚主。然观其《早入谏院》诗云:‘紫云重叠抱春城,廊下人稀静漏声。偷得微吟闲倚柱,满衣花露听宫莺。’诗虽旖旎,岂谏院中言语?风骚意旨,未易窥寻也”(郭绍虞 2067)。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注解方式,向来饱受“浮艳”之讥的近体诗在政教功能上取得了与古体诗势均力敌的地位,所谓“可以润国风,广王泽”(杜荀鹤《唐风集序》)。作为齐梁、大历诗歌之继承与推崇者,晚唐的五律创作也因此确立了自身的某种范式价值。其后,宋元明清诗论家以比兴之法解注汉魏六朝以及唐诗正源于唐人对这一系统的发展,而晚唐诗格在其中作用尤深。

在从诗道层面肯定近体并将其纳入风雅比兴体系的同时,针对格卑辞靡之讥,晚唐诗格家皆致力于提升五律的格调,试图消弭古今体制之差异。与孟郊古风之主张“道语必疏散,儒风易凌迟”(《答友人》)中所蕴含的复古意蕴相似,贾岛及其追随者的辞淡之境也并非仅限于艺术风格层面,而是彰显“儒风”的一个重要体现。《风骚要式》“琢磨门”条云:“夫用文字,要清浊相半。言虽容易,理必求险。句忌凡俗。意便质厚。如郑谷

《送友人诗》:‘流年俱老大,失意自东西’,此君子离位也。[……]虚中《寄司空图》:‘岂思为邻者,西南太岳青’,此未忘臣节也。今之词人循依此格,则自然无古无今矣”(张伯伟 454)。齐己论诗屡称“古律”,如“近闻为古律,雅道更重光”(《寄武陵微上人》)、“古律皆深妙,新吟复造微。搜难穷月窟,琢苦尽天机”(《酬微上人》)、“五首新裁剪,搜罗尽指归。谁曾师古律,君自负天机”(《谢丁秀才见示赋卷》)等。时人论齐己诗亦许以“格高”,如徐仲雅《赠齐己》称其“格何古”“意何新”“调何雅”“语何奇”。又尚颜《读齐己上人集》:“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古雅如周颂,清和甚舜弦。”

“高古”之外,诗格家还致力于提升五律之“雅调”,并将政教观念层面的“雅”推衍至修辞、意境层面的“雅美”,如“卷帘当白书,移榻对青山”“远道擎空钵,深山踏落花”(张伯伟 400—401)一类。晚唐诗僧之五律多半于此用力,如无可《酬姚员外见过林下》:

扫苔迎五马,蒔药过申钟。鹤共林僧见,云随野客逢。入楼山隔水,滴旆露垂松。日暮题诗去,空知雅调重。

较之初盛唐,晚唐五律中的景色、物象是一种高度审美、艺术化的意象。就风格而言,则体现出对含蓄之美的追求,《炙毂子诗格》有“模写景象含蓄体”条。《诗格要律》则有“含蓄门”,并举贾岛“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句为例。晚唐诗风的清雅幽隐风格的形成与这种趣味有着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作为唐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涌现绝非偶然,而是“儒者”主体意识与诗风极盛背景相结合之产物,是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诗教”观念在诗歌批评层面的一个最集中、独特的体现。与以科举为导向的经学教育相交织,诗成为孤寒沉沦之士彰显儒道、修身立心之要道。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者之心的深意,诗派因之以成。承五臣注《文选》以比兴之法笺注汉魏古诗的作法,借助于“物象”“内外意”等新批评概念,诗格家将唐人近体纳入到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比兴笺诗”话语体系之中。在从“诗

道”和“格调”双重层面提升其诗学、诗史地位的同时,对晚唐诗歌的重立“意”以及隐喻性、象征性的增强都有深刻影响。其弊端则是失于拘泥、琐碎、刻板,但它在整个唐诗学发生过程中的意义却不能一概抹杀。

#### 注释[Notes]

- ① 对此问题加以集中探讨的,如郭鹏、尹变英《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比物讽刺”内涵及其意义》指出苦吟之中所蕴含的政教内涵(《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此外,郑伟《物象说与晚唐五代讽喻诗的新理念》则以“讽喻”为中心,探讨了“物象”说与诗教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 ② 与汉代的经学之儒不同,有唐一代之“儒业”几乎是科举之代称,如皇甫湜《赋四相诗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服膺究儒业,屈指取高位”。又白居易自称“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旧唐书》卷一六六)。与之相应的,“儒者”也多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科举之士,如白居易《劝酒》:“邻家儒者方下帷,夜诵古书朝忍饥。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东邻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风势,金榜高张登上第。”
- ③ 参见钱志熙:《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复旦学报》,2014年第6期。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Chen, Zhensu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corded Books of Zhiz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7.]
-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
- [Ding, Fubao. *A Continuation of the Notes on Poetry of All Tim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3.]
- 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Dong, Gao. *The Complete Literary Prose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丙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Fu, Xuancong. *An Assemble of the Five Dynasty History Books*. Hang Zhou: The Press of Hang Zhou, 2004.]

——:《唐人选唐诗十种》。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The Ten Collections of Tang Poetry Selec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Xi'an: People's Educational Press of Shanxi, 1996.]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Guo, Shaoyu, ed. *A Continuation of the Notes on Poetry of the Qing Dynasty*. Punctuation. Fu Shous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3.]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Liu, Xu. *The Old History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Pi, Xirui. *A History of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Wang, Zhongyong. *The Annotation of Tang Poetry Chronicl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Zhang, Bowei.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Poem Format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Nan Jing: The Ancient Books Press of Jiangsu, 2002.]

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Zhou, Shaoliang. *The Annot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Geniuse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Zhou, Xunchu. *The A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Diverse Writing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责任编辑:查正贤)